

# 上 编



## 第一章 善殖利于外

山西因地处太行山以西而得名，属于古晋国所在地。周灭殷商后大封诸侯，公元前 11 世纪，周成王封弟唐叔虞于今山西西南部，建都于唐（今山西翼城西），时称晋国。在以后 500 年中，晋国逐渐兼并了周边小国而强大起来。到了晋文公时因改革内政导致国家富强，在城濮战役中大败楚军，成为春秋霸主。公元前 4 世纪中叶，晋国为韩、赵、魏三家所分。因此，山西又称三晋，简称晋。在古代，山西还曾被称为“山右”，谓其在太行山右侧；又被称作“河东”，因其位于晋陕交界之黄河以东而得名。因此，在古籍中山西商人常被称作“山右商人”或“河东商”。

### 一、表里山河，路当孔道

山西位于华北大平原以西，万里长城的内侧，黄土高原的东部，介于太行山与黄河中游峡谷之间。由于东靠太行，西临黄河，所以山西自古就有“表里山河”的雅称。

山西的自然地形十分独特，号称“最为完固”，四面都有天然的屏障，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地区。山西东面巍峨

绵延的太行山脉，把它与华北大平原分开；西面奔腾咆哮于晋陕大峡谷的黄河，又把它与陕西省隔离。南部有中条山、黄河作为天然屏障，北边是雄伟壮丽的万里长城，外有阴山大漠险地，内有勾注、雁门等关隘。这种地形，使它很少受到历代王朝更替与社会动荡的影响。纵观绵延数千年的古代史，你就能发现，山西周边的陕、冀、豫等省都曾爆发过多次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农民大起义，如汉末的河南黄巾起义等。这些农民起义军在中原大地上纵横驰骋，战火熄灭后总是骸骨遍野。三晋地区则几乎没有爆发过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外面的战乱劫难也很少波及。这就使山西成为大动乱时代周边省份百姓天然的“避风港”，山西的人口也越来越壅滞，以致在明清史籍中一再出现“土狭民稠”的记载，因而迫使许多山西人走出狭隘的“表里山河”到外面闯荡天下，尔后在不知不觉中闯出了一个称雄宇内的庞大地域性商人集团——晋商。

山西的地理位置早有“晋省路当孔道”之誉。早在先史时代，晋南地区是中原文明圈的中心，是尧、舜、禹与华夏族活动的基点。进入文明社会后，历代王朝虽不曾在山西建都，然而他们的都城又都在山西附近，在三晋周边的西安、洛阳、开封、北京一带交替。毗邻王朝统治心脏的山西就负有“屏蔽中央、拱卫首都”的重任，所以这些朝代均把山西视为一个军事要地加以构筑。山西一失，这些都城立时门户大开，再无关险可依。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就是在占领山西后，短短数日之内就攻陷了北京城，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被逼在煤山上吊自尽。清代学者顾祖禹曾总结道：“明既定都于燕（指北京），而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盖以上游之势，系于

山西也。”<sup>①</sup>

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山西自古以来商业就相当发达。现代学者王孝通先生认为晋人在春秋时期就以善贾著称：

晋之地利 不亚于齐国 其民又多俭啬之风 忧  
深思远，不事娱乐，故与商业之性质尤宜；近世山  
西商贾，著称宇内，盖其所由来者远矣<sup>②</sup>。

《史记·货殖列传》也有这方面的记载，“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晋南洪洞、汾阳一带成为当时商贸重镇。到了隋唐时期，国内商业异常繁荣，国际贸易也得到迅速发展，当时中国通往域外的陆上商贸通道共有六条，经过三晋地区的就有两条：

一是由大同北经绥远、归化至恰克图，它是横跨欧亚大陆的重要国际商道。

二是自长安经幽州、辽阳渡鸭绿江达朝鲜（高丽）。

到了元明清时代，由于三朝均定都北京，从北京出发，经太原至西安，再沿河西走廊可达新疆、中亚地区，走的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这三条重要的内陆国际商道都经过三晋地区，中外客商步履匆匆的身影很早就进入了晋人的视野，山西商人也很早就涉足于国际贸易业。明清之际，他们就频繁来往于塞外蒙边地区，进行获利甚丰的易货贸易，从而在蒙古大草原上崛起了一个以山西商人为主体的实力雄厚的庞大商业集团——旅蒙商帮，在晋商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 二、煤铁之乡，资源丰饶

山西省虽然土地贫瘠，但自然资源却十分丰富，是公认的资源大省。盐、铁、煤等重要资源，自古以来就很有名。盐铁两项，从汉武帝实行官营专卖制度以来，一直是历代王朝的重要赋税来源。三晋地区的盐、铁生产历史悠久，蕴藏量大、产量高，号称“河东盐铁之利甲天下”，为历代王朝所重视。

（一）盐。盐可分海盐、池盐、井盐等数种。山西境内所产主要是池盐，以晋南的安邑（今运城）、解州（今运城西部）两盐池尤为重要，合称“河东盐区”。这些盐池所在的运城盆地，在距今 2600 万年前的新生代第三纪时，大部分为湖泊，后来慢慢地就壅积成现在的盐池。晋南盐池每逢夏天暑热时，池中盐分就会自然结晶成盐粒，采捞、储存均十分便利。

晋南池盐早在先史时代就为当时人所利用。《左传》载，春秋时期晋大夫韩献子称晋南盐池为“国之宝也”。汉武帝时，由于频繁对外用兵导致国库空虚，在理财大师桑弘羊等人的建议下，实行了盐铁官卖政策，在各重要的产盐、产铁区设置盐官、铁官，盐铁业从此为历代王朝所垄断。汉代在全国 27 个郡设置了 34 个盐官，在山西省境内就有 3 郡 4 个盐官，即河东郡安邑、太原郡晋阳、雁门郡楼烦（今宁武县内）、沃阳（今左云）。“安邑之盐甲天下”，安邑盐晶莹润洁白，专供京城宫廷贵族食用，安邑也在诸盐官中居于首位。

河东盐区的盐业收入一度曾居全国之冠。史载，在唐元和年间（806—820年）山西河中府的解州、安邑“两池盐利，岁收百五十余万缗”占当时唐朝盐利收入的1/5。到了北宋，由于采用了新的采盐法，保证了晋南盐池长期获得高产，如宋至道三年（997年）两池得盐300多万席，每席116.5斤，共计35亿斤（宋制）。

到了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开始实施开中法，始自山西，在纳粮中盐的商人中，晋商占了绝大部分，晋南盐池所产的盐大多用于开中盐引。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晋南盐池每年仅用于开中制的盐就达62万引，合计124万斤。明中叶后，改纳粮中盐为折色（即纳银）中盐，万历六年（1578年）山西省共纳银20.4万余两，几乎占全国纳银总数128万两的1/6，可见山西盐业对国家财政的重要作用。

（二）铁。山西省还是我国重要的产铁地区，铁矿资源丰富，分布广，品质好，矿石品位一般在40%~50%，易冶炼。战国时已发现山西有铁矿资源。《山海经》一书记载，晋东的白马之山（今孟县东南）“其阴有铁”，往南150公里的维龙之山“其阴多铁”，再往南85公里的柘山“其阴有铁”。根据出土文物可知，春秋战国时期，三晋一带使用铁器已较普遍，冶铁业已相当发达。公元前153年，晋国最先使用铁铸造大型刑鼎，所用的铁是从民间征收的，可见当时民间冶铁业已有相当规模。《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几个靠冶铁业致富的巨贾，其中有两个出于三晋：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

赵、魏（梁）均属三晋地区，孔氏以冶铁为业，卓氏更是靠冶铁致富，足见当时三晋冶铁业之发达。

到了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官营，在各地设置了铁官，当时全国有 49 个县设了铁官，其中山西有安邑、皮氏（今河南西）、平阳（今临汾）、绛、大陵（今文水东北）五地设了铁官，占全国的 1/10 强。这时，山西已用煤作燃料冶炼铁了。

唐代，山西地区的冶铁业继续得到发展，岳阳、翼城、交城、五台、阳城等地也开始大量产铁。其中太原产的铁镜，并州产的铁剪、铁刀，均闻名于世，太原铁镜还作为贡品进贡唐代宫廷。大型铸件的制造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最著名的当为唐开元十九年（731 年）造成的蒲津铁索桥。两岸各铸铁牛 4 个，每个重数万斤，铁牛下面“熔铁为山”，又用 16 根铁柱将牛腹相互连接起来，使铁牛、铁山连成一体，再用大铁索连接两岸，铁索上铺设木板，就成了沟通东西两岸的铁索桥，合计建造此桥共用了几十万斤铁，可见当时山西产铁量之巨。

明朝初期在全国设立了 13 个铁冶所，管理各地的官办冶铁业，山西占了 5 个，即富阳（今乡宁）、丰国（今吉县）、大通（今太原）、益国（今晋城）、润国（今潞安）。当时交城产的铁质量最好，时称“云子铁”，专用于制作兵器，成为明朝重要的兵器原料基地。

到了清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 年）山西民间手工业制铁业发展相当迅猛，并在长治荫城镇形成了全国性的铁货集散市场，铁货行销全国各地，每年交易额高达 1000 万两，可见当时山西商人从事铁货生意者大有人在。道光年间 1821

—1850年)晋城县有生铁炉 1000 多座 熟铁炉 100 多座 铸钢炉 400 多座,每年产铁量多达 13 万吨左右,而且品质相当优良。

(三)煤炭。除盐铁之外,煤炭更是山西的重要矿产,蕴藏量大,埋藏较浅,含煤层多,易于开采。全省含煤面积 5.7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含煤总面积的 36.5%,因此山西素有“煤都”、“煤铁之乡”的美誉。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就在山西发现了煤炭,“孟门之山,其上多苍玉,多金,其下多黄垚,多涅石。”<sup>③</sup>孟门之山在今山西吉县,“涅石”就是古代对煤炭的称呼。煤炭首先被古人用于生活方面,《北史·王劭传》载,王劭在任晋阳县令时,曾说及当地人“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火”。日本僧人圆仁法师在唐开成五年(840年)前往长安途中,路过太原城西 1.5 公里左右的晋山时,目睹山上遍地都是石炭,当地人就用这种乌黑的石头当作燃料料理饭食,这种燃料极有火势。

到了宋代,以无烟煤作燃料和方炉坩埚炼铁法在山西冶铁业得到了广泛应用,时有“河东铁、炭最盛”<sup>④</sup>的说法。随着采煤业的迅速发展,煤炭的利润也极为可观,因此宋王朝也开始对煤炭实行官卖制度,并向采煤窑户和煤商课以重税,令窑户与煤商苦不堪言,收入低微。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时任河东路转运使的陈尧佐上疏朝廷请减煤税,“河东路以地寒民贫,仰石炭为生,奏除其税。”<sup>⑤</sup>元明清三朝都把煤炭课税视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而山西上交的煤税占着重要的地位。

除了盐、铁、煤外,山西其他自然资源也很丰富,《史记·货殖列传》载:“山西饶材、竹、穀、纆、旄、玉石。”在唐

宋以前，山西自然环境还没遭到很大破坏，一些地区仍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唐朝河东、上党、晋阳等郡都有大量粮食由汾河漕运京师长安，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年）河东道储存的粮食达350万石，居全国第二位。唐宋后，由于黄河流域地区滥砍滥伐成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明清时陷入了“土瘠硠薄”的窘境，吞下了自身造成的苦果。

在古代，三晋南部地区还是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晋南吉县一带是重要的蚕桑产区，曾有过村村种桑、户户养蚕的盛况，晋南至今还有许多以桑为名的村庄，足以说明当时桑田面积之大。元明之际上党盆地的蚕丝纺织业已有相当规模，“在昔（指明朝）盛时，其登机鸣杼者奚啻数千家。彼时扬力全盛，海内殷富，贡篚互市外，舟车辐辏者转输于省直，流行于外夷，号称利藪，其机则九千余张……明末尚有二千余张。”<sup>⑥</sup>潞安一带所产丝绸称潞绸，驰名中外，并作为贡品进贡，每年都要向明廷进贡5000匹。因为潞绸适于北方地区穿用，在北方销量极大，号称“衣被天下”，以至于晋南本地蚕茧不够供应，于是许多山西商人就千里迢迢地到四川阆中（今保宁）贩运阆丝供应潞绸织业的生产。

三晋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山西商人从事贸迁有无、低进高出的商业贸易活动提供了极好的物质条件，盐商、铁商、丝绸商均是山西商帮中颇为活跃、影响较大的商人。他们充分利用自身熟悉市场行情、易于集中进货的有利因素，经过长途贩运把这些物资运到外地高价销售，从而获得丰厚利润。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商人把本地匮乏的物品或原料从外地大量低价购进以满足山西市场所需，如上面提及的从四川贩运阆丝供应潞绸生产，“票号第一家”日升昌前身西裕成颜料庄

也从四川进原料生产铜绿颜料。由于山西每年均需从外地购进大量粮食，粮商素以资本大、获利丰而著称，平阳“亢百万”就是以经营粮食业起家成为三晋巨富的。总而言之，山西这块丰饶而又贫瘠的土地，为山西商帮的崛起和鼎盛创造了一个可以纵横驰骋的历史舞台，而庞大的山西商业集团的成功经营，也为山西赢得了“海内最富”的美名。

### 三、县县皆商，人人皆贾

晋商是明清之际实力最为雄厚、经营最为多元化的地域性商人集团，与江南地区的徽商（即新安商人）齐名，但当时人们认为晋商的财资与势力已超过徽商。明嘉靖权臣严嵩权势熏天，在位期间，搜刮民膏，巧取豪夺，聚敛起数不清的家财。其子严世蕃也同样贪婪成性，并且还有一个癖好：搜刮满百万两银子，就要广邀狐朋狗党大摆筵席以示祝贺。有一次，在饭饱酒酣之际，严世蕃一时性起，与几位狐友为当时的天下富豪排名次。经过提议，将资产 50 万以上的列为一等，共计 17 家其中皇亲国戚、朝廷重臣占了 12 家，平民出身的豪商巨贾共 5 家，晋商占 3 家，徽商占 2 家。明代谢肇淛也认为山右商人（晋商）要富于新安商人（徽商）：“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

晋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达数百年，这与山西地区普遍存在的重商贱儒、求富逐利的社会风气是分不开的。这种重商风气与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观念格格不入，甚至为最高统治

者所关注与探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皇帝南巡回京后感慨道：

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sup>⑧</sup>。

雍正二年（1724年）九月，大臣刘于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之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深表赞同，朱批道：

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sup>⑨</sup>。

在清朝，山西许多府县应试科举的人数呈明显下降趋势，以至于不足上榜额数，令地方官府大为头疼。皇帝重臣也在国事决策和奏谕中郑重其事地加以讨论，可见山西重商轻儒的社会风尚在忤逆中国传统观念的轨道上走得有多远。但他们不会明白，山西人之所以迷恋于商贾末业，起初是被三晋地区恶劣的生存环境逼出来的。

当我们的视野越过三晋原野上的漫天黄尘，翻开尘封发黄的古代史册，我们就会听见山西大地上穿透数千年重史重障传来的凄怆不绝的哀声：

昔唐人都河东……土地小狭，民人众……故其俗纤俭习事<sup>⑩</sup>。

（晋）土地沃少瘠多，是以伤于俭啬<sup>⑪</sup>。

其地在万山之中，险狭而饶薄，民力田勤苦，岁获不及他郡之丰，故土俗自古称纯俭，其势然也<sup>⑫</sup>。

土地沙碛饶薄，风高天寒，丰岁亩不满斗，故

中人日仅再食，俗多俭啬<sup>⑬</sup>。

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这么恶劣的环境与贫困的生活，并没有使山西人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用暴力行动来改善自身的生活处境。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没有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是发源于山西的！即使是大灾之年也是如此。山西人把暴戾的破坏性心理化解成了俭啬的民风，换来了三晋大地的数千年平静安宁。

山西人的俭啬之风非常有名，即使对死人也是如此。山西人在埋葬亲人时，不是一人一墓，而只是分别男女异穴而葬，以节省宝贵的土地资源。三晋富有的大户人家，也是没有宾客上门不上酒肉，爱打扮的妇人也不穿价昂的丝绸服装，对可能的自然灾害始终保持着警觉。

但当生存的起码条件都不能达到时，脚下贫瘠的黄土地，还有什么可以让人留恋呢？是恪守古训，困穷故土？还是背井离乡，闯荡天下？许多山西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于是，在三晋大地的一个个村口边，一次次地响起了那首浸透情泪的湿漉漉的民歌《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

在“小妹妹”凄凉悠婉的“走西口”的歌声中，山西商人开始启程出发了，他们出边陲运粮中盐，远涉塞外进行易货交易，下江南购进棉布，出关外销售铁货，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商业资本一点点地积累起来，一个地域大商帮就在

他们匆匆的步履与辘辘的车轮声中不知不觉地诞生了。

可以想见，在这些最早背井离乡、出外贸迁的山西人背着鼓鼓的包裹回到家乡，不作声张地建起了鹤立鸡群的北方大院时，会在村子里引起多大的轰动。他们的发财经历会成为村里人几个月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们也会成为不安现状的年轻人的典范。是的，通仕与务农都没有什么前途与指望时，列为末业却能带来财富的商贾就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了。就这样，在求富逐利的强大动力驱使下，重农贱商的传统观念不堪一击地败下阵来。

到清朝，重商逐利之风已成为三晋的主流民风，经商致富被认为是光耀门庭的行为，而封建社会里最受尊崇的“士”山西人却看得一文不值；“最下者方令读书”招致许多读书子弟也弃儒从商，趋之若鹜。这种民风，令不少寒儒迂士为之痛心疾首：

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而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余见读书之士，往往羡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能得志以行其道……<sup>⑭</sup>

在这种民风影响下，才华出众的年轻人纷纷进入商途，为日益壮大的山西商帮源源不断地补充着新鲜的血液，他们观念新颖，勇于开拓，目光远大，视野开阔，继承了前辈商人的成熟与精明的经营策略，摒弃了其迟缓与保守的经营方式，抓住机遇，不断拓展商业活动空间与经营品种，把山西商人

的事业一步步推向新的辉煌。和其他地域商帮相比，晋商在商业资本规模、经营活动区域、经营品种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他们。像介休侯氏金融帝国、祁县乔“在中堂”商业金融集团等家族企业，不仅在国内商界独占鳌头，即使与当时的欧美大公司相比，也毫不逊色。难怪当时人感叹，山西是“县县皆商，人人皆贾”，贫瘠的黄土地却蕴积了厚实的商业精神，走出了令世人惊叹的庞大的地域性商人集团。

注 释：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

② 王孝通《中国商业史》，上海书店 1984 年 1 月版，第 33 页。

《山海经·北山经》。

《宋史·食货志》。

《宋史·陈尧佐传》。

⑥ 顺治《潞安府志》卷一，地理四。

⑦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⑧ 《东华录》康熙二十三年二月上谕。

⑨ 《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七册。

⑩ 《史记·货殖列传》。

⑪ 《隋书·地理志》。

⑫ 《山西通志·风俗》。

⑬ 《大同志》。

⑭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6 月版，第 17 页。

## 第二章 车辙马迹遍天下

14 世纪末的一天，晋中的南北通衢大道上，一眼望不到边的人流在缓缓地行进着，他们扶老携幼，背负重囊，哭泣声响彻原野，一步三回头，痴痴地遥望着那无法割舍的故土

.....

这就是著名的明初大槐树移民潮。这些强制性的移民来到洪洞广胜寺边一棵大槐树下，办理了迁移手续后就要千里跋涉，离开故乡，去一处完全陌生的地方定居生活。

晋商的长达 5 个多世纪的漫长旅程从这里开始了，从强制性的大槐树移民到走西口闯关东谋生计的自发移民再到“车辙马迹遍天下”的山西商帮，一个明清时期最为强大的地域性商人集团以其非凡的勇气与智慧走完了极富创造性与悲剧性的旅程。沿着这个漫长的旅程，我们可以回溯过去，追忆历史，了解到他们是如何从贫穷走向富有，又是如何从富有回到贫穷。

### 一、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在华北地区许多地方的居民家里，都保存有完整的家谱

或族谱，一本泛黄的薄纸本上记载着先祖的生活经历，维系着血脉相连的亲情长河。不约而同地，许多人家的家谱或族谱第一页都首先提到了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名：山西洪洞大槐树。也许，在你很小很小的时候，你的母亲就教你哼过这样的民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那绵远忧深的曲调，会使你不自觉地在岁月之河中回溯过去，去寻觅自己的生活之根。

山西洪洞大槐树，就是千千万万家族和居民的根，他们的祖先，都是在明朝初期从山西境内迁徙而来，又从这里迁移出去。

洪洞是山西省中南部一个历史悠久、交通发达的古县。县东北有著名的名胜古迹——广胜寺。但洪洞之所以为人熟知，是因为它是著名的京剧折子戏《苏三起解》的发生地。明朝正德年间，京城名噪一时的名妓苏三（艺名玉堂春）在洪洞蒙冤落难，关押她的监狱也在山西洪洞。这一明代监狱因此又名苏三监狱，至今尚保存完好。除此之外，洪洞还与一件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密切联系着，这就是元末明初的洪洞大槐树大移民。

元朝末年，中国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灾荒，再加上元朝统治者贪婪无度，掠夺成性，山东、安徽等地广大农民揭竿而起，起义风起云涌，元朝统治者顾此失彼，忙于招架，经过 20 来年的长期战乱，元朝灭亡了，一代枭雄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张士诚等地方势力，统一了全国。据统计，元朝全国原有人口是 9000 多万人，到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统计，只有 5600 多万人，剧减 1/3 还多。全国各地特别是中原地区遗骸遍野，地旷人稀，呈现出一片极度凋敝的局面。红